

胡适

与中国现代思潮



周质平 著

有七分證據說幾
還更重要

分話有七分證據不
大胆的假設

能說八分話
小心的

南京大學出版社



胡适

与中国现代思潮



周质平 著

南京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 / 周质平著. —南京: 南京大学出版社, 2002. 9

ISBN 7 - 305 - 03829 - 6

I. 胡... II. 周... III. ①胡适(1891~1962)-人物研究 ②胡适(1891~1962)-思想评论 IV. K825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0885 号

书 名 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
著 者 周质平
责任编辑 杨金荣
责任校对 莫 菲
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
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编 210093
电 话 025-3596923 025-3592317 传真 025-3303347
电子邮件 nupressl@publicl. ptt. js. cn
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丹阳教育印刷厂
开 本 880×1230 1/32 印张 12.875 字数 292 千
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1--5000
ISBN 7 - 305 - 03829 - 6/B · 298
定 价 20.00 元

*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*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,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所购
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

自序

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，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。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，从“整理国故”到“全盘西化”，他不但是提倡者，也是总结成果的人。就学术研究而言，胡适的影响及于中国哲学、史学、文学各个层面。甚至于近代中国语法研究，胡适也是少数先驱之一。

就社会改革而言，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，从个人主义到“好人政治”，这些口号和运动都是和胡适分不开的。他几乎成了20世纪初期，中国新思潮的总汇；因此，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成果，都或多或少地归结到了胡适的身上。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中，胡适成了一个不是“首功”就是“罪魁”的两极人物。

在中国现代史上，胡适相信要怎么收获，先怎么栽；有几分证据，说几分话。他不相信权威，不相信捷径，不相信有“包医百病”的“万应灵丹”，不相信社会主义，也不相信“知难行易”的三民主义。他相信“功不唐捐”，努力不会白费；他相信“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”。

在胡适的著作中，虽不乏对中国文化严厉

2 ◎ 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

的批评,和对西洋文明热烈的赞扬,但这种种都丝毫不影响他对中国文化的依恋和爱护。他一生的终极关怀始终是中国文化的重建和再造。

胡适一生的工作和努力是和中国前途分不开的。如果我们将“中国”这个成分从“胡适”这个名词中抽离,“胡适”立即成了一个虚幻。胡适的功也好,过也好,唯有在“中国”这个大前提之下,才有意义。

本书所收是我多年来研究胡适生平和思想的部分心得。论文内容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组,第一组是胡适与他并时学者的比较研究,在胡适与鲁迅、冯友兰、赵元任、梁漱溟、钱玄同的比较中,一方面可以看出两人在思想和个性上的异同,一方面也多少反映了一些时代思潮的侧影。第二组文字则是就胡适思想作专题探讨,他的文学理论,他对科学与民主的阐释,对政治的态度,以及他早期思想中的爱国,都有专文讨论。这些论文除少数几篇曾在北京和上海等地学术期刊上发表过以外,绝大多数都是第一次在大陆出版,此次结集出版,在文字上作了一定的增删。

周质平

2002年5月26日

于普林斯顿大学

目 录

- 自序 /1
1. 胡适与鲁迅 /1
 2. 胡适与冯友兰 /42
 3. 胡适与赵元任 /92
 4. 胡适与梁漱溟 /122
 5. 胡适与钱玄同 /140
 6. 胡适文学理论探源 /164
 7. 读胡适的《尝试集》——新诗的回顾与展望 /186
 8. 胡适的游记 /196
 9. 评胡适的提倡科学与整理国故 /206
 10. 胡适对民主的阐释 /229
 11. 胡适英文著作中的中国文化 /250
 12. 冷眼与热肠——胡适对政治的两种态度 /287
 13. 胡适早期思想中的“爱国” /306
 14. 超越不了“国界”的“是非”
——胡适对中国婚俗的态度：由批判到辩护 /325
 15. 超越不了传统的“现代”
——从家书看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父子情 /335

2 ◎ 胡适与现代中国思潮

16. 胡适笔下的日本 /349
17. 胡适的暗淡岁月 /369
18. 不思量,自难忘
——胡适给韦莲司的信 /397

胡适与鲁迅

一、序 论

胡适(1891~1962)与鲁迅(1881~1936)是民国以来,在思想史及文学史上,影响最大的两个人。他们都是学者兼为“社会活动家”,表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、政府、时局多方面的关怀。他们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剧烈的变革时代,在中国近代的改革中,扮演了重要的脚色。他们早年都受过传统的中国教育,20岁左右留学海外。胡适去了美国,由农科改念哲学;鲁迅去了日本,由医学转到文学。胡适的这个改变,虽不像鲁迅那么戏剧化,因为看了几张日俄战争的幻灯片,见到了中国人遭日本人砍头的情形,而发愤要改变中国人的精神,作一个“心理”医生^①;然而胡适毕生的努力,也无非是为中国当时的“病症”,开出了他自己的处方。

^① 见鲁迅《呐喊自序》,《鲁迅全集》(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1,共16卷),卷1,页415~420。

就近代中国的学术史而言，胡适是个多方面开创新局的人物。在白话文运动上，他是“首举义旗的急先锋”，中国之有新诗，自胡适的《尝试集》始。在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上，他有《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》、《白话文学史》，这些都是开山的典范巨著；在小说研究上，有《红楼梦考证》等十余篇重要学术论文，开一时古典小说研究之风气；在禅宗史的研究上，作《荷泽大师神会传》，校定敦煌唐写本《神会和尚遗集》，并发表有关禅学研究中英文论文多种，为中国禅学勾勒出了可信的历史发展。在新文化运动和社会改革中，胡适也是一时之领袖，他提倡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的“实验主义”，保持个人人格和思想独立的“易卜生主义”，主张妇女解放。在社会主义披靡中国知识分子的20年代里，他坚持“少谈主义，多谈问题”。在30年代独裁与民主的辩论中，他不因为中国经济和教育的落后，而对中国走民主的道路，有任何怀疑。胡适是继梁启超之后，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领袖人物。

鲁迅在学术上的贡献，除了在小说史的研究和古小说的勾沉上，有创新的建树外，其他方面是不能和胡适相提并论的。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却为近代中国文学史创一新纪元，使中国的短篇小说彻底地摆脱了晚明《三言》《二拍》式的言情、公案、讲史的布局，在故事中夹带些轮回报应、惩恶劝善等等的老套。鲁迅的短篇小说，无论是故事的主题，人物的描写，情节的安排，对话的运用，都开前人所未有之新局。不但反映了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，同时也预示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的方向。鲁迅的小说超越了传统小说劝善的道德命意，而是对人性、生命乃至对民族性的反思。至今，中国短篇小说内容之深刻，文字之简练，仍未有能超出《呐喊》《彷徨》的。鲁

迅的短篇小说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划时代的，但这样前无古人的“新”，却又丝毫无碍其与晚清的小说在历史上的系联承继。不像胡适的新诗，创新有余，而承继不足，从旧诗到新诗有时不免让人有断层之感。新文学运动虽由新诗始，但其成绩却是体现在小说上。

在五四运动前后，胡适和鲁迅无论是对白话文的推行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，他们的态度都是一致的。可是在政治上，他们却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思想潮流：胡适偏右，而鲁迅偏左；一个崇尚美式的民主自由，一个相信俄共的社会主义。这点政治见解上的不同，终于使这两个曾经同开风气的人物，渐渐的由合作而分歧，走向了两个不同的方向。

鲁迅故世后，其全集的一再版行，铜像的树立，纪念馆的落成，多少有点将鲁迅偶像化的意味。

每当我看到那些颂扬鲁迅的文字，总不免让我想起鲁迅在《骂杀与捧杀》这篇文章里，说到泰戈尔 1924 年访问中国的时候，徐志摩等人“说得他(泰戈尔)如像活神仙一样，于是我们地上的青年们失望，离开了。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？……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，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。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。”^①而今，鲁迅自己也被说得“像活神仙一样”，我只怕地上的青年们也要“失望，离开了”。而鲁迅也免不了要受到“老大的晦气”。批评家们似乎不懂一个人固然可以被“骂杀”，也可以被“捧杀”。

周作人(1885~1967，字启明，号知堂，鲁迅二弟)晚年，在写给鲍耀明的信中，对时人之捧鲁迅，有极沉痛的话：

① 鲁迅：《骂杀与捧杀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，卷 5，页 586。

现在人人捧鲁迅，在上海墓上新立造像——我只在照相上看见，是在高高的台上，兀坐椅上。虽是尊崇他，其实也是在挖苦他的一个讽刺画，即是他生前所谓思想界的权威的纸糊高冠是也。恐九原有知，不免要苦笑吧。要恭维人不过火，即不至于献丑。^①

在另一封致曹聚仁的信中，周作人又说：“（鲁迅）死后，随人摆布，说是纪念，其实有些实是戏弄。”^②周作人是当事人，又是后死者，对鲁迅的深知，又远非他人所能及，所以他的见解毕竟高人一等。凡是把鲁迅继续往上捧的人，都应该为了爱护鲁迅，尊敬鲁迅，而三复斯言。

与鲁迅相比，胡适身后的际遇是惨淡得多了。鲁迅死后两年即有全集印行，以后又有“新版”的全集，分别在1958、1981年问世，有注解，有各种索引，搜罗之全，翻检之便，堪称中国古今集部之最^③。近几年来又有《鲁迅研究资料》之出版，截至1989年已出了22辑。举凡与鲁迅有过关系之人、物、事、地，无不为之详细考索，妥善保存。反观胡适，辞世已四十年，不但全集之版行至今没有眉目，甚至连一本完整的传记亦不曾见，更不必

① 周作人、曹聚仁：《周曹通信集》（香港：南天书业公司，1973），第1辑，页32。

② 周作人、曹聚仁：《周曹通信集》，第1辑，页49。

③ 《鲁迅全集》首刊于1938年，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，收入著作、译文和辑录的古籍，共20卷。1956到1958年之间，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编辑，只收鲁迅自己撰写的著作，共10卷。1981年的16卷本，是以10卷本为底本增收《集外集拾遗补编》、《古籍序跋集》、《译文序跋集》和《日记》。第16卷为著作年表及索引。

说立铜像，建博物馆了。以南港故居改建的“胡适纪念馆”，无论是规模、出版、财力、人力各方面都远逊于北京的“鲁迅博物馆”。然而，胡适身后的这点萧条之气、冷落之感，也正是鲁迅之不可及处。胡适全集之所以编印无期，多少是因为他的思想，在国共两面都不讨好。这点双方都觉得“违碍”的事实，正是胡适“独立自主”最佳的说明。胡适“盖棺”虽已四十年，但始终不曾被“论定”；鲁迅却是“棺”未盖，而“论”已定。林语堂说鲁迅愈老而“党见愈深”^①，这话是很耐人寻味的。

1950年代初期，中国大陆各阶层发动了一个历时数年的胡适思想批判运动，此后近30年，在中国只有胡适批判而没有胡适研究。这个情形，最近20年来，有了相当的改变。不但胡适著作在大陆重新出版，而且有关的传记和研究也随着政策的开放，而日见其多。胡适研究在中国大陆居然很有成为“显学”的趋势。在现有大陆出版的胡适著作中，以199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欧阳哲生所编的《胡适文集》12册，及胡明主编，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《胡适精品集》16册为最全，但胡适晚年所写的一些重要文字多未收入^②。

有人总是把鲁迅视为苦难大众或工、农、兵的代言人。其实，“五四”前后的知识分子大多瞧不起群众，鲁迅也不例外。“阿Q”是鲁迅作品中“群众”最好的写照。“群众”在鲁迅眼中，是愚昧、无知、自私的代名词，而他是自居于“超人”的。在

① 见林语堂《鲁迅之死》（台北：德华出版社，1980），页6、7。林语堂的这篇悼文写在1936年11月22日。原载1937年1月1日的《宇宙风》，第32期，题为《悼鲁迅》。

② 如1950年由香港自由中国出版社出版的《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》一书中所收九篇文章，除《自由主义》一文，收入《胡适文集》第12册《胡适演讲集》（文句小有异同）外，其余8篇都未收入。《胡适精品集》所收稍多，但仍不全。

铁屋中呐喊，唤醒沉睡的中国人，这正是以先知和救世主自居。

鲁迅的深刻绝不体现在某一个政治理念上，而是体现在他对人性有深层的掌握，并了然于中国人的冷漠与残酷。有些批评家是在一片颂扬之中“厚诬”了鲁迅，把鲁迅讲浅了，也讲窄了。

诚然，如周作人所说：“（胡适）也有他该被骂的地方。”^①只是那些为了政治运动而批胡的文字，却不曾动得胡适分毫。

二、交谊：由合作到分歧

鲁迅长胡适 10 岁，但成名却比胡适晚。民国六年（1917），胡适以 27 岁之青年任教北大，并由于提倡白话文而驰名全国。这时鲁迅已年近四十，蛰居北京也已五六年，在教育部任佥事，是个闲缺，住在绍兴会馆，平时则以抄古碑、玩古董消遣。五年以后（1920），鲁迅在《呐喊自序》中回忆这段日子：

S 会馆里有三间屋，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，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，而这屋还没有人住；许多年，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。客中少有人来，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，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，这也就是我

^① 周作人、曹聚仁：《周曹通信集》，第 1 辑，页 101。

唯一的愿望。^①

这种孤寂落寞的情怀，倒很有点像胡适 20 世纪 50 年代住在纽约时的心情；但这种心境绝非民国初年的胡适所有。初回国门的胡适，真是意气轩昂，讲学，著作，文学革命，社会改良，在各方面他都是一时之领袖，生命绝无“暗暗消去”之可能。

1918 年在鲁迅的生命史上，是极重要的一年。从这一年起他应钱玄同(1887~1939)的邀请，开始在《新青年》上撰稿，成了新文学运动中重要的一员。著名的短篇小说《狂人日记》就是这一年写成的。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也从这一年开始。从他们的书信及日记中，还可依稀看出两人过从的情形。

初识的头几年，只有鲁迅日记中有一些极简短的记录。胡适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《鲁迅全集》的时间是 1918 年，8 月 12 日的日记：“收胡适之与二弟信”。次年，5 月 23 日有“夜胡适之招饮于东兴楼，同坐十人”一条。一个月之后，鲁迅同周作人到第一舞台看胡适一生中所写唯一的话剧《终身大事》。^②

1921 年 1 月间，鲁迅与胡适曾为《新青年》该不该谈政治有过几次书信往返。胡适主张《新青年》不谈政治，成为一个思想与文艺的杂志，鲁迅则认为不必特别排除政治问题。^③这个意见上的分歧并没有影响到两人的交往。同年 3 月，在一封致周作人的信里，胡适还特别邀请周氏兄弟，加入他所发

① 见鲁迅《呐喊自序》，《鲁迅全集》，卷 1，页 418。

② 分见《鲁迅日记》，页 324、357、359，《鲁迅全集》，卷 14。

③ 关于《新青年》该不该谈政治的几封信，收入张静庐辑注《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》，（北京：中华书局，1954），《关于新青年问题的几封信》，页 7~16。

起的《读书杂志》。^①

鲁迅在十几年以后(1934年)回忆《新青年》时代胡适所给他的印象,在《忆刘半农君》这篇文章里,鲁迅比较了陈独秀、胡适之与刘半农三个人:

《新青年》每出一期,就开一次编辑会,商定下一期的稿件。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。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,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,大书道:“内皆武器,来者小心!”但那门却开着的,里面有几枝枪,几把刀,一目了然,用不着提防。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,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:“内无武器,请勿疑虑。”这自然可以是真的,但有些人——至少是我这样的人——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。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“武库”的一个人,所以我佩服陈、胡,却亲近半农。^②

其实,这段话无非是说胡适“狡诈”而善于作为。几十年来,骂胡适为“反动派”、“帝国主义走狗”的颇不乏人;说胡适阴险的,鲁迅是第一人。也许就因为鲁迅对胡适常怀着“戒惧”之心,所以两人的交往始终仅止于较正式的接触,这从鲁迅对胡适的称呼可以看出,鲁迅在信中始终以“适之先生”相称。鲁迅长胡适10岁,又是《新青年》的同事,称胡适“先生”,未免太

① 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(北京:中华书局,1979,共3册),上册,页128:“启明兄:我现在发起这小玩意儿(指《读书杂志》),请您帮忙。豫才兄处,请你致意,请他加入。”

② 鲁迅:《忆刘半农君》,《鲁迅全集》,卷6,页71~72。

客气了，倒是周作人反以“适之兄”称胡适。

看了前引的这段话，不免让我想起胡适“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”的名句，而鲁迅待人之道则往往是胡适做学问的法子，亦即“在不疑处有疑”。

胡适与周作人的过从比鲁迅密切。1922年，胡适曾推荐周作人去燕大任“中国文”一门的主任，待遇极佳，^①后以周作人生病，没有上任，一年后（1922年3月4日）胡适又特别把周作人介绍给燕大校长司徒雷登（John Leighton Stuart, 1876~1962）。胡适觉得“启明在北大，用违所长，很可惜的，故我想他出去独当一面”^②。周作人虽长胡适6岁，但仍受到胡适的“提携”。

胡适不但替周作人介绍过工作，1921年也为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谋到过一个月薪60元的职位。^③

1922年8月11日，胡适有日记，可以看出他当时对周氏兄弟的印象及交往的情形：

演讲后，去看启明，久谈，在他家吃饭，饭后，豫才（鲁迅本名）回来，又久谈。周氏弟兄最可爱，他们的天才都很高。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，而启明

① 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上册，页123~124。当时的待遇是：“（一）薪俸，不论多少，都肯出。他们的薪俸通常是二百元一月，暑假加北戴河避暑的费用。（二）全不受干涉。”

② 杜春和、丘权政、黄沫选编：《胡适的日记选》，见《新文学史料》，第5辑（1979，11），页281。

胡适将周作人介绍给司徒雷登的事，参见胡适《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》，《独立评论》，第108号，页415。

③ 见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，上册，页123~124。

的赏鉴力虽佳，创作较少。^①

胡适对周氏兄弟，似乎并没有鲁迅那样的“戒心”。在文学革命初起的那几年，胡适是将他们兄弟作为“同志”看待的，并深以新文学阵营中得到这样两位高手为幸。这段期间，鲁迅也曾劝过胡适从事文学创作，胡适也颇为所动。1922年3月4日，胡适有如下日记：

与启明、豫才谈翻译问题。豫才深感现在创作文学的人太少，劝我多作文学。我没有文学野心，只有偶然的文学冲动。我这几年太忙了，往往把许多文学的冲动错过了，很是可惜。将来必要在这一方面努一点力，不要把我自己的事业丢了来替人家做不相干的事。^②

虽然胡适之把“文学创作”看做是他“自己的事业”，但1922年以后，他除了偶而作些新诗以外，在文学创作上，真是一片空白。而鲁迅主要的成就却在小说上，他的杂文虽然如匕首，如投枪，凌厉无匹，但由于多评时事，今人已经必须借长篇的注

① 杜春和、丘权政、黄沫选编：《胡适的日记选》，见《新文学史料》，第5辑（1979，11），页281。

胡适将周作人介绍给司徒雷登的事，参见胡适《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》，《独立评论》，第108号，页282。

② 杜春和、丘权政、黄沫选编：《胡适的日记选》，见《新文学史料》，第5辑（1979，11），页281。

参见胡适《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》，《独立评论》，第108号，页415。